
評內藤丘《藏語、緬甸語和漢語的歷史音韻學》

Hill, Nathan W.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ibetan, Burmese and Chine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xiv+373.

鄭子寧

墨爾本大學商業與經濟學院

王雪婷譯

書評

漢藏語最早被承認為一個獨立語系已有一個多世紀，至今該領域已取得了長足進展。但是，對原始漢藏語的重建只是零星的嘗試，沒有達成多少共識，並且該語系中不同語言之間的譜系關係仍然存在爭議。內藤丘（Nathan W. Hill）的新書《藏語、緬甸語和漢語的歷史音韻學》代表了探索早期漢藏語系、亦即書中所稱的「泛喜馬拉雅語系」（Trans-Himalayan languages）的新嘗試。為保持行文一致，以下也使用此名稱代替常用的「漢藏語系」。

泛喜馬拉雅語系歷史音韻學存在一個迄今研究不足的關鍵領域，即構建健全的語音定律，用以描述這一系列語言的語音發展，而本書的出現正好彌補了此一學術空白。

健全語音定律的構建，在印歐語系的研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現代印歐語系中某些同源詞的形式，如英語、法語、波斯語和孟加拉語，都可以通過應用一系列相應的語音定律推導出來，相關定律亦可套用到它們的共同祖語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不過在某些情況下，還要考慮其他因素，例如類推拉平。此外，語音定律的時序對於建立語言譜系樹具有重要意義。舉一個例子，「格林定律」（Grimm's Law）成功勾勒出日爾曼語族異於其他印歐系語言之處，其所解釋的音變現象早於高地德語子音推移，後者影響了一組遵從格林定律的次級方言，亦即古高地德語方言。格林定律的眾多例外情況最終一一為「維爾納定律」（Verne's Law）妥善解釋，這使相關的語音定律極為規範。

相比之下，雖然使用比較語言學研究泛喜馬拉雅語系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¹ 但長期以來缺乏系統的規律性。正如內藤丘在導言中所述，該書的目的是為泛喜馬拉雅語系建立印歐語系式的語音定律，而本書其後各章無疑很好地實現了這一最終目標。

內藤丘著重研究該語系中三大分支，即藏語、緬甸語和漢語，也是擁有最悠久書寫傳統的語言。這選擇合乎邏輯，因為對於這樣富於創始意義的研究，使用資料最多的語言來構建框架至為明智。他從三種語言最早有文獻可徵的階段入手，繼而追溯它們各自最早的狀態，最終一直上推到同一語系所有語言的假想始祖——泛喜馬拉雅語。

1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考慮到三種語言中任何一種的歷史音韻學都有許多問題尚待解答，要整合每種語言的進展證據並形成一個連貫的體系誠非易事。此外，漢語和藏緬語之間的傳統二分法，以及因而產生的漢語研究和藏緬語研究之間的割裂，也帶來了相當困難。從取得泛喜馬拉雅語系歷史音韻學全貌的角度來看，漢學家和藏緬甸語專家之間的對立不利於整個語系的研究進展，尤其是考慮到泛喜馬拉雅語系分類中首將漢語與非漢語兩分處理並非毫無爭議。²

以漢語歷史音韻學為例，新近的研究進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與藏語的比較研究，但是許多研究僅僅使用藏文，因為書寫語言以外的藏語對相關學者來說仍很難理解。

漢語和藏語從其共同祖語分化出來的年代，比任何藏語書寫材料出現的時間都早了數千年，而兩種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亦變得模糊。同源詞的歸類通常是個別確認的，因此往往不甚嚴格，甄別的標準亦可能模糊不清，從而給構擬原始語帶來了問題。

使用藏文（或書面藏語）而不用現代拉薩方言的內在邏輯，不外乎是前者是目前可以明確接觸的最古老藏語，而且從理論上講，它也最接近分化出藏語和漢語的祖語形式。在相同的邏輯下，當然，越早的藏語階段越有幫助，

2 Laurent Sagart, Guillaume Jacques, Yunfan Lai, Robin J. Ryder, Valentin Thouzeau, Simon J. Greenhill, and Johann-Mattis List, "Dated Language Phylogenies Shed Light on the Ancestry of Sino-Tibet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6, no. 21 (2019): 10317–322.

因此本書有關藏語歷史音韻的章節至為必要。

關於藏語的部分首先介紹了最早期的書面藏語、古藏語及其旁支源（如藏語支）。接著以逆時序的方式逐一勾勒語音的變化，使用內部和外部證據確立產生那些變化的各種可能條件，最終逆推至原始藏語支（Proto-Bodish）。然後，又按時序簡述了原始藏語支發展到中古藏語的情況，以印證相關語音定律及其先後次序。然後重複一遍相同的程序，由原始藏語支進一步推導到泛喜馬拉雅語，並在最後一節審視哪些謎題尚待解決。

隨後探討緬甸語和漢語的章節亦採用同一套樣式處理。一般而言，這種樣式有助梳理出一條合理、簡潔和易讀的敘事線，不然要解釋這樣一系列複雜而混亂的過程將極為艱巨，因為過程中受大量干預因素的影響，不同的語音變化會在不同的階段起作用。此外，正如上文提到德國語言學家雅各·格林（Jacob Grimm）提出了格林定律，內藤丘彙集了此前發現的各種語音定律，並以發現者的姓氏為之命名。

這裡舉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說明本書的研究方法。書部分談及「田雅客定律」（Dempsey's Law），即軟顎音前的元音 **e* 和 **i* 會合併，以及「白保羅定律」（Benedict's Law），即 **lʲ > ʒ*（頁 12–15），內藤丘首先用古藏語軟顎音之前普遍不存在 *e* 的現象，並結合漢語證據來說明田雅客定律。然後，為了闡釋白保羅定律，著者利用了藏語 *ʒ* 與漢語、緬甸語邊音的對應關係，以及藏語的內部證據，即邊音 *l* 之後置入硬顎音中綴 *y* 會音變為 *ʒ*（例如：

藏語 བཞེན་ *bžen* < *bl^ʷen「升起」；藏語 ལའོ་ *lan*「升起」）。而有些單詞在元音 *-i-* 之前仍保留 *l-*，是白保羅定律優先於田雅客定律發生所致，白保羅定律發生作用時，這些單詞含有的仍是元音 *-e-*。

在不丹使用、鮮為人知的藏語支語言庫爾托普語（Kurtöp）中，田雅客定律並未發生作用，正好拿來作反證，進一步證明田雅客定律所反映的藏語的新變，是在藏語和庫爾托普語分離之後才發生的。實際上在緬甸語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頁 70–71），但從各自發生的相對時序所見，藏語和緬甸語的當前狀況是平行發展的結果，並不能用來證明兩者的親緣關係更為親近。

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是，第 13 頁列舉的庫爾托普語的例子在軟顎音前都沒有元音 *-i-*，因此這些元音未能顯示與相應的漢語同源詞有明顯的對應關係。其實著者這裡可以給出更多的例子，以更好地支持論證。

本書討論藏語的部分涵蓋了廣泛的問題。另一個值得特別提及的例子是，內藤丘探討了一部分藏語詞形變化的起源和年代及其對語音史的影響，也闡明了其他泛喜馬拉雅語系語言的詞形問題。總體而言，研究泛喜馬拉雅語系的讀者都會受益於內藤丘淵博的藏語及藏語支知識。

緬甸語給研究者帶來一個獨特的難題。在本書詳論的三種主要語言中，緬甸語的書寫傳統最短。妙悉提佛塔碑銘（Myazedi inscription）是現存最古老的緬甸銘文，書寫年代為十二世紀初。其時緬甸人已經向南遷徙，新的聚居地原本由南亞語人群（或許還有其他種族）居住，使得

緬甸人能接觸許多不同的語言，並且很可能經歷了複雜的民族形成和語言影響過程。

值得慶幸的是，阿茲語（Atsi，即載瓦語）、勒期語（Lashi）、阿昌語（Achang）和仙島語（Xiandao）等緬甸語群在許多方面都比古緬甸語更為保守，可以為原始緬甸語中存在清輔音和濁輔音之分提供證據（頁 55），同時證明古緬甸語出現了各種語音定律，如「沃爾芬登定律」（Wolfenden）描述的 $-*ik > -ac$ 、 $*-ij > -aññ$ （頁 59–60），以及「溫銳定律」（Maung Wun）描述的軟齶音之前 $*u > o_2$ 在”（頁 60–62 頁）。不過，內藤丘基於資料和構擬陳舊過時而將彝語支（Loloish）排除在外，事實上彝語支也許可以給予我們新的研究觀點。

內藤丘聲稱古緬甸語缺乏介音 $-w-$ ，而緬甸文中的 $-wa-$ 源於古緬甸語 $-o-$ 。但是，在彝語支北部方言的涼山彝語中，「蹄」一詞是 $/k^h a^{33}/$ ，與「我」 $/ŋ a^{33}/$ 韻母相同，但與「口」 $/k^h u^{33}/$ 不同：我們知道，涼山彝語與漢語的「口」為同源詞，後者的上古音構擬為 $*k^h \text{r}o?$ （此處據白一平—沙加爾 2014 年的構擬方案），包含元音 $-o-$ 。這是否可以說明早期緬甸語跟上古漢語一樣， $-o-$ 和 $-wa-$ 可能同時並存，至少緊貼在軟齶音之後如此。

另一點值得提的是，內藤丘將所有緬甸文中包含韻母 $uiñ / uik$ 的單詞識別為外來語，因此從古緬甸語的音系中剔除了相關韻母。雖然其中絕大多數確實是外來詞，主要來自孟語，但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詞 $\text{ႤႬႬ} buik$ （表腹義），音韻上與漢語的「腹」 $fu < *p(r)uk$ 非常相似，語

義對應也幾乎完全相同，換言之現在剔除 *uik* 可能操之過急，需要進一步研究其對古音構擬的意義。

內藤丘將最多篇幅留給上古漢語。在所選的三種語言中，漢語應當是最費周章的一種，箇中涉及大量原因，亦理所當然地需要最長的篇幅。本書的漢語部分基本遵循了2014年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沙加爾(Laurent Sagart)提出的上古音構擬方案，但內藤丘在採用時不忘提出對其優缺點的思考，並間或提出一些可能的補救辦法。與古代漢語相比，古藏語和古緬甸語比較徑直地上接作為祖語的泛喜馬拉雅語，因為兩者都有大量直接證據足徵，加上採用拼音字母書寫系統，許多聲韻細節都比古漢語來得準確。反觀上古漢語的構擬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難免為研究者帶來重大難題。

令情況進一步複雜化的是，較之於藏語和緬甸語，漢語缺乏可以幫助構擬的近親語言，也許只有原始閩語(Proto-Min)差可承擔這項功能。儘管古藏語、古緬甸語和古漢語都稱之為「古」，但古藏語和古緬甸語可以視為解難的工具，古漢語本身則是難題最難解的部分。

由於古漢語的時間跨度大，漢語書寫系統的語音表達又相對模糊，上古音的構擬亟需創新的方法。內藤丘以簡潔的方式總結了構擬上古音的方法，包括以中古漢語作為參考座標進行內部分析、分析漢字的聲符、整理古詩的韻讀，以及取資於原始閩語、越語支(Vietic)和壯侗語系(Kra-Dai)。

不得不承認，漢語部分看起來比前兩部分要複雜得

多。上古音的語音定律既不完善也不成熟，不過「定律」二字意味著規律性，而目前上古音構擬中許多問題仍懸而未決，規律無疑是一種奢望。白一沙的構擬有時會以方音雜糅（*dialectal admixture*）來解釋一些貌似不甚規則的變化，例如他們所構擬的韻尾 **-r* 在某些情況下變為 **-n*，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又變為 **-j*。³ 同樣，我們很難解釋該構擬從泛喜馬拉雅語到上古漢語的發展過程中，前置音節與主音節結合鬆緊的差別，如果再考慮到這些前置輔音在古漢語具有的構詞功能，則問題可能愈發複雜。

誠然，我們無法扼殺上古漢語有不同方言和方音雜糅的可能性，但要準確地總結出語音定律，就必須進一步探索上古漢語裡的各種方言，以及相關方音雜糅的本質和影響。此外，有需要進一步研究其他語言中的漢語借詞，因為借詞進入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的時間跨度和地理區域都很大。

內藤丘提出了一些新穎的想法，例如韻尾 **-rl* 的存在（頁 206），以及上古音 **-k* 部分源於 **-kə*（頁 201）。也許隨著更多出土古文字（通常反映古代方言）等新證據出現和對外來詞機制有更好的理解，我們最終將能夠使用規律的語音定律，從古漢語中構擬出泛喜馬拉雅語。

不過書中有些提法可能站不住腳。如第 204 頁，著者參考了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和清瀨義三郎則府（*Kiyose Gisaburo Norikura*）對「虎」字的上古音

3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8.

構擬 *stay，對漢語「虎」*hu* < *q^hraʔ 和藏語同一詞 ལྷག་ *stag* 進行了對比。這樣的比較難以令人信服，尤其是鑑於南亞語系的語料證據顯示，漢語中「虎」一詞可能是外來詞（參考高棉語「虎」 𑄎𑄓 /k^hla:/），因此可以說漢語與緬甸語中的表「虎」義的 ၵာ̃ *kyā* 一詞可能同源，但不能說漢語和藏語的「虎」起源相同。

本書的最後一章根據之前各章得出的結論，集中討論了泛喜馬拉雅語，以現有的最佳材料證據構擬其語音系統。這仍然只算是初步工作，借用內藤丘的話說是「今後發展的基石」，但已經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嚴謹的語音定律的力量。其中一個支持漢語和非漢語二分法的有力論據是，上古漢語保留了 *-a- 和 *-ə- 之間的區別，而在非漢語語言中這兩個元音合而為一。著者通過仔細檢查例外的情況，發現古緬甸語在特定語音條件下保留了這種區別，而反思規律的對應關係也激發出一些有趣的問題，例如思考：1) 漢語中「A類」區別的由來；2) 原始緬語支 (Proto-Burmish) 前聲門化的來源；3) 三種語言之間的顎化不對應（頁 258）。

本書既解決了一些問題，也開啟了泛喜馬拉雅語系研究的新一章，很多問題還有待討論，絕不限於以上提到的。對於漢語歷史音韻學的進深研究而言更開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內藤丘證明藏語和緬甸語中的送氣塞音屬於次生起源，要闡明這個現象就得對上古漢語裡的送氣塞音作出一致的解釋，畢竟後者似乎自有漢語以來就一直存在。我們不禁要問：泛喜馬拉雅語中送氣塞音的實情為何？

正如無法單憑梵語、希臘語和拉丁語來構擬原始印歐語一樣，僅以書中討論的泛喜馬拉雅語系三巨頭，即藏語、緬甸語和漢語，大概不足以反映泛喜馬拉雅語的全貌。這三種語言被絕大多數研究視為同一語系的重中之重，但是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一種語言在當下的重要性不應賦予其更高地位。對其他泛喜馬拉雅語系語言的研究進展，如對包括嘉絨語（Rgyalrong）、西夏語（Tangut）在內的羌語支研究，可能會使我們更好地了解此一語系的早期歷史。正如印歐語系的每個主要分支都對原始印歐語的構擬做出了貢獻一樣，僅憑三種語言來重建原始泛喜馬拉雅語是根本不可行的，無論它們多具代表性。

總的來說，這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凡有志研究泛喜馬拉雅語系的人都會從中得益。它不僅是「今後發展的基石」，而且是現階段一流的參考書。漢語歷史音韻學家僅仰靠藏文和緬甸文提供的證據而發表文章，可謂屢見不鮮，而對於一些不諳漢語歷史音韻學最新進展的學者，乞靈於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構擬來檢驗上古音的證據，也是時有所聞。但是，高本漢的構擬是在將近一百年前提出的！因此，內藤丘的新書無疑會激發這個領域的研究興趣，提供嶄新的思路。

應該注意的是，大概為了原始材料保持一致，內藤丘對不同語言使用了幾套不同的標音方案，而不是單純使用國際音標。對於不熟悉相關方案的人來說，這自然會帶來一些障礙，更甚者，所採用的幾套方案之間互有抵觸，譬如同一符號可以代表不同的語音，反之亦然。本書的讀者

應嘗試熟悉這些轉寫方案，以免混淆，而這篇評論盡可能襲用著者所用的寫法。

總體而言，考慮到研究範圍的廣度、內容的深度和涉及的多國文字，編校工作的水平允稱上乘，值得表揚。儘管如此，這裡列出兩條失校之處，以便日後再版時改正。頁 330，漢語「夜」一詞誤植為普通話同音字「业」（同樣讀 yè）；頁 165 注 77，原來“*huw* < **mə-g^ʔ(r)o* (monkey)”一條的字頭應為「猴」，卻誤排了「蕨」字。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研治泛喜馬拉雅語系的讀者無疑會感到附錄非常有用，當中收錄同源詞表和書中論及的主題的更多範例。

內藤丘的文筆優秀，成功令本書變得易讀能懂。這本書思路清晰易從、內容深入淺出，漢語音韻學的傳統術語都在相關章節一一解釋，因此讀者毋需預先具備大量專業領域的知識也可上手，對於業餘愛好者和專家而言都是一本合適讀物。

儘管有少數不足之處，本書依然有筭路藍縷之功，是運用嚴格的語音定律構擬泛喜馬拉雅語的首批嘗試之一，對泛喜馬拉雅語歷史音韻學功莫大焉，將會啟發後來者作更深入研究，這點毋庸置疑。